

论李白诗歌的夜郎意象及文化意义

韩大强

(信阳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夜郎是中国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的先民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夜郎在古代曾以国名、族名、人名、郡名、县名、坝名被史册记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因永王李璘事件被流放夜郎后,写了30多首涉及夜郎的诗歌,加之后来的文人墨客创作了一些吟咏夜郎的作品,尤其是写了大量的为李白流放夜郎鸣不平的诗歌,于是“夜郎”成为愁苦、不得志的象征。因此,由李白流放夜郎、书写夜郎而生发出的夜郎意象,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独特意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夜郎不仅是地名、族名、人名等物质性的代指,而且已经演变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专有名词,成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关键词:夜郎;李白;诗歌意象;文化价值

OSID: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821(2025)02-0128-06

一、概述

夜郎是中国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的先民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最早明确记载夜郎国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1]2912}。后来的《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都有关于夜郎国的记载。夜郎国大约在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左右被汉王朝所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夜郎由“国”变“郡”变“县”,其行政区划不断变更,但大体分布在今天的贵州、云南以及湘西南、渝东南一带。

夜郎的行政区划在唐代废置、变更比较频繁,而且地域设置不统一。据史载,唐代夜郎大致有两处。

一是唐武德三年(620年)原牂牁首领谢龙羽遣使者朝贡,朝廷拜谢龙羽为牂州刺史,并封之为夜郎郡公^[2]。武德四年(621年)析夷州的宁夷县置夜郎县(今石阡县西部一带)。贞观元年(627年)废夜郎县。贞观八年(634年)置巫州析龙标县为夜郎(今黎平县与铜仁一带)、郎溪、思微三县。天授二年(691年)改巫州为沅州。长安四年(704年)夜郎县

与渭溪县合并置舞州(今镇远县)。天宝元年(742年)改舞州为龙溪郡,析夜郎县地为峩山县(今岑巩县东北)。唐朝在夷州、巫州、沅州、舞州等地建置的夜郎县,时而废置,时而更名,大约存在一百余年。

二是贞观十六年(642年)唐代宗在夔、渝之界间设置播川镇,后改为珍州,置夜郎(今桐梓县内)、丽皋、乐源三县。天宝元年(742年)改珍州为夜郎郡,不久,并夜郎郡入溱州,改称溱溪郡。乾元元年(758年)再分出夜郎郡仍称珍州。元和二年(807年)再并珍州入溱州,下辖夜郎(今桐梓)、荣懿、扶欢、丽高、乐源等5县。唐代后期再废夜郎县。李白流放的地方就是珍州夜郎。在唐代夜郎属于黔中道,黔中道的设立经过了从“江南道→江南西道→黔中道”的变更过程,黔中道乃唐玄宗开元年间所置,包括黔州、费州、巫州、辰州、播州、夷州、珍州、溱州、溪州、施州、黔中等。黔中道域内山高谷深、道路迤逦、民风剽悍,时人谓之“蛮夷之地”“瘴疠之乡”。

唐代用流放和贬降的方式惩处犯罪或犯错官员,即所谓的流贬刑罚。在《唐律疏议》中明确载有流刑条目,并将流刑分为常流、五流、特流及长流等

收稿日期:2024-12-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2CWX046)

作者简介:韩大强(1965—),男,河南罗山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与文化。

引用格式:韩大强.论李白诗歌的夜郎意象及文化意义[J].信阳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5(2):128-133.

HAN Daqiang. The Imag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Yelang in Li Bai's Poetry[J]. 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 45(2): 128-133.

类别,常流亦称为三流,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和三千里,是最为常见的流刑^{[3]2137}。李白在至德二年(757年)流放夜郎就属于常流。唐朝的主要流贬地是“岭南”“黔中”“陇右”等偏远荒蛮的地方。据日本学者辻正博在《唐代贬官考》一文中的统计,有唐一代的贬官1027人^①。又据王娟的硕士论文《唐五代黔中道客居文人及其涉“黔”诗作》的统计,唐代黔中道地区客居文人为42人^②。唐代流贬至黔中的文人学士心中充满了委屈、愤懑,到了“边恶之州”“化外之邦”,往往触景生情、心生哀怨,便创作了或抒发心中郁闷之情,或描写流贬之地风土人情的诗歌。

被流贬之人大多为朝中官员、将士、文人等,他们不仅是饱学之士,而且具有治国理政、带兵打仗、文化传播的能力,而被流贬之地,往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较为落后。因此,他们来到流贬之所虽然委屈悲怨,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的历史意义。

李白因永王李璘事件流放夜郎,行至途中遇赦得以放回,这段人生经历对李白打击很大。李白在流放夜郎的途中创作了一系列抒发人生失意、悲凉之慨的诗歌,诗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白虽然最终没有抵达夜郎,但是对黔中文化影响却很大,至今西南地区依然流传许多关于李白的故事与传说。另外,李白的《送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经典诗句,被广为传唱,更加强了人们对夜郎的记忆。

二、李白流放夜郎与诗歌创作

(一)李白流放夜郎考

李白受李璘事件的牵连被流放夜郎。安史之乱爆发,永王李璘等奉父皇玄宗旨,招兵买马合力平叛,但在玄宗西逃的路上太子李亨在众大臣的合谋下已经于灵武即位,尊玄宗为上皇帝。在这种情势下,李璘不听肃宗李亨让他不要轻举妄动之告诫,还一意孤行,因此李璘之举被肃宗视为谋逆,派兵讨伐,李璘兵败被杀。安史之乱平息后,肃宗回到长安,开始对李璘一党进行清算,凡追随李璘的将士官幕僚或杀或流贬。李白虽然自辩被胁迫入李璘幕,且在崔涣、宋若思、郭子仪以及妻家宗氏等众多亲友的多方营救下,但还是被判流放夜郎。

《旧唐书·文苑下·李白传》云:“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4]503}《新唐书·文艺中·李白传》则云:“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

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5]159}新旧唐书把李白入李璘的前后经过记载得较为清楚,认为李白是主动干谒李璘的。但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文中则说自己是被“胁迫”的。无论是主动干谒还是被“胁迫”,在李璘府做幕僚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胁迫”是李白自言,难免有为求赦免而自编之嫌。从李白在永王幕所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江上答崔宣城》《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等诗中可以看出李白当时的得意扬扬、雄心勃勃,丝毫没有勉强之意。

李白被流放夜郎,是否到达了夜郎贬所史上所有争议,有人认为未至夜郎,还有人认为已至夜郎。《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载:“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认为李白未到达夜郎贬所。宋代曾巩也认同未至夜郎的观点,他说:“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浔阳……”^[6]认为李白走到巫山附近遇赦返回。其后诸如宋代薛仲邕,明代文学家杨慎,清代学者郑珍、莫友芝等皆持此说。但明清学者张澍、黎庶昌,以及近人周春元《李白流放夜郎考》^[7]、张才良《李白流放夜郎的法律分析》^[8]、蒋志《李白与旅游》^[9]、胡大宇《李白与夜郎》^[10]等,认为李白流放至夜郎。同时,学界关于李白流放夜郎出发时间地点、行走路线、何时何地遇赦、夜郎在何处等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其实,李白本人在《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息秀才》中说“半道承恩放还”。因此,从《新唐书》《旧唐书》以及李白的诗歌这几则比较权威的史料来看,陈述了一个基本事实:流放夜郎,途中赦还^③。

唐代黔中道与外地的交通有三条线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由黔州沿长江向下经三峡→江陵(荆门)→江夏(武汉)→浔阳(九江)……水路坐船比较方便,沿途官方设有驿站。李白去夜郎走的就是这条路线,逆江而上。其实,前往夜郎还有一条路,就是当年王昌龄被贬龙标县(巫州)走的:从江宁到洞庭湖,折向西南由岳阳到朗州溯沅水西上,再到卢溪→辰阳→麻阳→巫州(龙标县)。综合史料和李白诗歌,大致可以判断:李白从至德二年(757年)底从浔阳(九江)出发,沿江西上,经江夏、洞庭湖,上溯三峡,至巫山,前往珍州夜郎,乾元二年(759年)春到巫山附近,因大旱朝廷大赦天下,流人及以下获赦,

历经3个年头。

(二)李白流放夜郎诗歌创作

李白流放大约在至德二年底开始起程,沿途作了《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流夜郎赠辛判官》《赠刘都使》《赠别郑判官》《流夜郎永华寺寄寻阳群官》《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泛沔州城南郎官湖》等诗歌。清代王琦编注的《李太白全集》收入李白直接涉及流放夜郎的诗作有32首^[11]。流放夜郎是李白人生转折点,其诗风由原来的豪迈飘逸、想象丰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变得幽怨愁苦、意境低迷、格调狭窄。正如明代学者江盈科在《雪涛诗评》中所说:“李青莲,是快活人。当其得意时,斗酒百篇无一语一字不是高华气象,及流窜夜郎后,作诗甚少,当由兴趣萧索。”^{[12]302}流放夜郎后,李白诗风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请托诉冤的寄言赠答诗增多。这些诗歌主要内容是请托说情辩白、感激亲朋好友于困境中相助,抒发哀怨冤屈之情。如《流夜郎赠辛判官》:“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用往昔之豪放与今日之落魄相比照,透出诗人凄凉与落寞之心境。又如《流夜郎闻酺不预》:“北阙圣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窜遐荒。汉酺闻奏钧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当时朝廷大赦赐酺,李白却不在被赦之列,故心情忧郁而作此诗。再如李白《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场》:“拙妻嫫媠剑,及此二龙随。惭君瑞波苦,千里远从之。”《南流夜郎寄内》:“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与妻弟、妻子的诀别,含冤负屈、感慨伤怀。

从《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这首诗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李白与故宰相张镐交谊深厚,非常感激老前辈在他困顿之时的安慰与帮助。又如《赠别郑判官》:“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献克复之美书怀息秀才》:“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赠刘都使》:“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从“泪空尽”“长愁”“憔悴”“愁夜郎”“窜荒谷”“衔哀”等低落哀怨之词中,流露出李白的离别愁绪。

李白遇赦后,即兴写了《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在流放途中少有的豪放之作。李白遇赦后的喜悦之情尽显无余,情随境迁,大悲大

喜。回途中李白又在江夏逗留了一些时日,写了《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等诗作,表达自己的或感激或愤懑之情。李白流放途中受到好友的热情接待,心理得到了些许慰藉,但平日里的豪放之情却荡然无存。

二是借古喻今的咏史诗增多。李白流放夜郎所作的30多首诗中有近一半带有借古喻今的特点。这些诗既有对历史上怀才不遇的屈原、伍子胥、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等表达了深切地同情,也暗含作者自伤自悼之情。如《放后遇恩不沾》:“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江上赠窦长史》:“汉求季布鲁朱家,楚逐伍胥去章华。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君登凤池去,忽弃贾生才。……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和贾舍人至游洞庭湖五首》其三:“洛阳才子谪湘川,元礼同舟月下仙。”李白借用汉代才子贾谊等人的不幸遭际来自喻人生坎坷,既有同病相怜的自悼,又有发自内心的精神认同。

再如,《赠易秀才》:“嗟蛇君自惜,窜逐我因谁。地远虞翻老,深秋宋玉悲。”《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与论文章。”无论是宋玉还是司马相如,都是历史上怀才不遇的代表人物,李白通过他们来抒发自己的悲情。

三是诗歌意境取象明显变小,基调也较为低沉。李白以叛逆罪入浔阳狱和长流夜郎,对其打击非常大。正如他在《在浔阳非所寄内》中云:“闻难知恸哭,行啼人府中。……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在监狱里写给家人的书信,字里行间充溢着痛苦绝望的意绪,以及世态人情的薄凉之感。又如《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不知旧行径,初拳几枝蕨。三载夜郎还,于兹鍊金骨。”《双燕离》:“憔悴一身在,孀雌忆故雄。双飞难再得,伤我寸心中。”《流夜郎题葵叶》:“惭君能卫足,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借咏燕、咏葵叶含蓄地抒发了远贬他乡、与亲人离别的哀怨之情。李白流放后的诗风一改往日的阔达雄迈、豪迈飘逸之风格,诗的基调变得低沉了,意境取象也变小了,多为抒写委屈悲慨之情。

再如《宿巫山下》:“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流夜郎永华寺寄待阳群官》:“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流夜郎西塞骚寄裴隐》:“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秋夕书怀》:

“北风吹海雁,南渡落寒声。感此潇湘客,凄其流浪情。”如果把“猿声梦里长”“安得苦愁思”“人愁春光短”“南渡落寒声”这些充满愁绪的诗句单独列出来,很难看出是诗仙李白所写。李白流放后的诗歌确实没有了昔日那种潇洒飘逸、豪情壮志,充满悲切、压抑之感。

三、夜郎意象的流变及文化意义

随着“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流行,尤其是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诗句的广为传唱,“夜郎”可谓尽人皆知。夜郎在古代曾以国名、族名、人名、郡名、县名、坝名被史册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夜郎不仅仅是地名、族名、人名等物质性的代指,而且已经演变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专有名词,成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一)夜郎意象的生成与流变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夜郎”的意指经历了从国名到人名、族名演变。《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对夜郎有相同的记载,即“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里指的是国家。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者,在蜀徼外。有夜郎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豚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10]2844}。夜郎已经演变为人名和族名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还载:“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立后。”^{[13]2848}以及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云:竹王“遂雄夷濮”^{[14]334}。“夷僚”“夷濮”意同,均指夜郎的创建民族(大概是现在的仡佬族)。从这几则史料来看,“夜郎”不仅是国名,也是人名、族名。后来“夜郎国”虽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作为民族的“夜郎”仍然存在,只不过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生了融合与分化。

夜郎在古代的行政区虽然发生变化,但大致位置在我国的西南边陲地区,那里山高路远、穷乡僻壤,在古代被称为“蛮夷之地”“瘴疠之乡”。从唐代开始,夜郎成为重要的流放之地,大量的官员、将士、文士被流放于此,尤其是自李白流放夜郎后,写了大量涉及夜郎的诗歌。后来的文人墨客创作了一些吟咏夜郎的作品,以及写了大量的为李白流放夜郎鸣不平的诗歌。于是“夜郎”变成为较为固定的诗歌意象,成为愁苦、不得志的象征。唐代诗人项斯《经李白墓》:“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身没犹何罪,遗坟野火燃。”为天才诗人鸣不平。中唐诗人戴叔伦《冬日有怀李贺长吉》云:“月冷猿啼惨,天高雁

去迟。夜郎流落久,何日是归期?”诗中“夜郎”已经与实地无关了,是幽怨失意的一种意象表达。因此,夜郎经历了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流变过程。夜郎不仅成为荒凉偏僻、贬谪之地的代名词,而且具有心理上的暗喻作用,也具有文学意象之意义了。只要流放夜郎,就表明流放者命运坎坷、政治失意。

(二)夜郎意象的文化意义

明代著名诗评家胡应麟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15]97}“当某一意象被诗人反复选取,它正体现了诗人的特定心态、特定的情感模式和审美模式”^{[16]2}。诗歌意象与审美趣味密切相关,作家在构建诗歌意象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情感特质和审美情趣。唐代诗歌意象丰富多彩,其中“夜郎”是其独特意象之一。

其一,“夜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有文化符号。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意象,“夜郎”意象便是其中之一。在唐代夜郎属于黔中道,唐诗中关于描写黔中道的诗歌很多,除了李白流放夜郎途中写了一些涉及夜郎(黔中道)的诗歌外,其他的文人学士也创作了许多涉及黔中道的诗歌。这些诗歌大致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客居黔中道文士(含流贬、任职、旅行等)的涉“黔”诗歌。统计发现共有56首,王昌龄26首、高力士3首、戎昱10首、窦群3首、房孺复1首、许彬1首、李频7首、贯休7首。二是未到黔中道涉黔诗歌。有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刘长卿、韩翃、贾岛、孟郊、卢僎、孙邈、李嘉祐、綦毋潜、苗发、司空曙、罗隐、权德舆、顾非能、周繇、羊士谔、吕温、许棠、王周、陈陶等,共计30首^①。比如,王昌龄自天宝八年(749年)贬龙标尉到天宝十四年(755年)离开龙标,长达6年之久。他是作涉“黔”诗最多的诗人,共26首。杜甫属于没有去过黔中道的诗人,但他写了《梦李白二首》:“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对李白被流放到“瘴疠地”“炎蒸地”的黔中道之夜郎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与不平。

唐代以后关于吟咏李白流放夜郎一事的诗歌也较多。如宋代苏轼《沿流馆中得二绝句》中有“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句;贺铸《和幽老郎官湖怀古》中有“白也遭时网,临年放夜郎”句;林季仲《谢李端明惠李翰林集》有“长流夜郎得不死,定知造物须怜才”句。宋代王庭圭就有一首《菩萨蛮》词,其序说:“绍兴十九年,谪夜郎。州学诸职事,邀就孔志行家圃宴集。时初至贬所,之美,夜久方归,恍然莫知为何所。酒醒,作此词以记之。”元代张以宁《题李白问月图》中有“迢迢夜郎外,垂光一何偏”句;陶安

《李翰林墓》中有“自别金銮抵夜郎,江南有梦到朝堂”句。这些诗句都是表达对李白流放夜郎的深切同情。

随着李白诗歌的广泛流传,以及关于李白研究的深入推进,到明清时期吟咏李白与夜郎的诗更多了。如明代杨慎《夜郎曲》云:“夜郎城桐梓,原东堞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夜郎当地人不识字的山村野夫都能讲李白的故事,可见李白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再如王叔承《采石矶吊李太白》中有“夜郎逐客浔阳囚,一片青山魂烂漫”句;宋濂《题李太白观瀑布图》中有“猿猴哀啼闻夜郎,苍天欲使诗道昌”句;吴中蕃《题怀白亭》中有“夜郎远窜谪亦轻,中道寻闻赦书至”句。以及程生云的《怀白堂》《桃源洞太白亭》、唐文燧的《怀李谪仙》等都是吟咏李白与夜郎的诗歌。清代魏裔介《读李太白诗》中有“元知功未酬,夜郎竞远戍”句;吴绮《李白》中有“可怜酒醉沉香后,独自崎岖向夜郎”句;赵熙《过夔州》中有“如今两岸猿声少,不尽春愁落夜郎”句。由此可见“夜郎”成为历代诗人歌咏的意象,尤其是与李白联系得比较紧密。

诗歌意象由特定的语境生成,如果脱离了具体语境,“孤立的各物便不复成其为意象了”^{[17]12}。“夜郎”成为具有独特寓意的诗歌意象,与其生成背景密切相关,夜郎与“蛮夷之地”、流贬之所联系在一起,也与李白的不幸遭遇有关。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夜郎意象不仅有天荒地远、与世隔绝之义,而且寓含着遭受挫折、政治失意之意。

其二,“夜郎”成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首先,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夜郎的意涵不断扩大,由最早的国名,发展到人名、族名等含义。夜郎国虽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其形成的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遗存等依然影响着西南地区,这些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次,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演变,夜郎已经从物质层面流变到精神层面,由具体到概念,夜郎的虚化是一个文化的建构过程,其形成的文化维度也是多元的,有物质文化、社会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夜郎文化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基因和源流,它体现在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日常行为和思想观念等方方面面,代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深刻地影响着当地少数民族的思想、性格、心理和生活^[18]。夜郎文化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和古文化的一种类型,是此地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至今仍产生着深远的、巨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人对夜郎认知的局

限性,如“夜郎自大”,影响夜郎文化的发扬与传承。因此,夜郎文化需要重新梳理、重新释义、重新命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弘扬、光大。

同时,李白流放夜郎和创作的涉及夜郎的诗歌,以及历代关于李白与夜郎的种种传说故事都构成了夜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桐梓、绥阳、遵义、綦江、涪陵、新晃等湘黔渝边区有诸多夜郎文化遗迹,尤其是关于李白流放夜郎的各种掌故、地名、诗词、纪念物和民间传说等,非常丰富,如太白坟、太白望月台、太白闻莺处、太白故宅、太白寺、太白泉、太白碑亭、太白书院、谪仙楼、夜郎溪李白石刻、桃源洞石刻、怀白堂等等。虽然李白流放夜郎中途赦还未至,但是西南地区到处留下李白的遗迹与传说,这表明当地人民对伟大诗人李白的喜爱与崇敬。这些遗存与传说出现时间绝大多数是宋代以前,甚至到清中期,这表明了它们也是经过历史的累积与沉淀逐渐形成的,是夜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李白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其故事满足了社会民众对文化的期待,从而成为民众意义生产的符号。段宝林先生在《民间文学教程》中指出:“民间故事是民众在特定民俗语境中以口头表演形式讲述并代代传承的散文叙事作品。”^{[19]65}传说中的故事往往是诗性的叙事,为受众提供了一种智慧、知识、族群记忆等许多历史事实之外的价值,而后凝聚成一整套符合族群发展的价值体系、符号象征和情感纽带。

四、结语

由李白流放夜郎、书写夜郎而生发出的夜郎意象,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独特意象。夜郎意象在中国文学史具有特定的意涵,且在历史的演进中增添了更加丰富的文化意蕴。在中国古代史学、文学中有大量关于夜郎的巫鬼、雄雌黄、竹枝词、文士流贬的记录。这些都说明了自汉代开发沟通夜郎始,经历代改置后的夜郎与中原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地交流与融合,并且相互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夜郎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有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如何发掘与阐释,需要顶层设计与科学规划,考古发掘、学术阐释至关重要。目前,西南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目的、争夺旅游资源需要,各自为政、自说自话,缺乏严谨科学的历史态度,有的甚至违背历史史实,任意打造夜郎文化景点,损害了夜郎文化科学、健康的发展。夜郎文化只有在借鉴历史学、考古学及民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行跨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与阐释,才能修复并再现古代夜郎文化风貌,进而发掘中国民族

传统文化的精髓。

李白诗歌中对夜郎原貌的揭示及展现,对西南地区的地方史、民族史的编写和旅游业的发展均有较大的意义与价值。因此,需要打破地域限制,认知偏见,把夜郎文化放在更高的层面去认识其人文精神与历史价值。

注释:

- ① 日本学者辻正博《唐代贬官考》,《东方学报》,1991(63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② 王娟《唐五代黔中道客居文人及其文学创作研究》,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统计资料来源:《旧唐书》《新唐书》《全唐诗》《太平广记》《资治通鉴》《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唐文》《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唐文拾遗》《唐刺史考》《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等。
- ③ 《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乾元元年)二月己巳,上皇帝号曰圣皇帝。丁未,大赦,改元。四月壬寅,朝享于太庙,有事于南郊。乙卯,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十月甲辰,立成王俶为皇太子。大赦。(乾元二年)三月丁未,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流民还者给复三年。”王琦年谱云:“公之遇赦当在此数月中。”《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四《以春令减降囚徒赦》:“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宋敏球:《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下注云:“乾元二年三月。”李白遇赦当在乾元二年三月。李白在大赦之时未遇恩赦,当指乾元元年二月、四月、十月三次大赦而言。
- ④ 统计来源于《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刘昫,等.旧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刘昫,等.旧唐书·刑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刘昫,等.旧唐书·李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宋祁,欧阳修,范镇,等.新唐书·李白[M].北京:中华书局.
- [6] 曾巩.李白集·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7] 周春元.李白流放夜郎考[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2):31-37.
- [8] 张才良.李白流放夜郎的法律分析[J].绵阳师专学报,1992(1):7-13.
- [9] 蒋志.李白与旅游[C]//中国李白研究(1997),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 [10] 胡大宇.李白与夜郎[C]//中国李白研究(2012)合肥:黄山书社,2012.
- [11] 王晓阳.李白流夜郎遇赦心态与诗歌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3.
- [12] 江盈科.江盈科全集·雪涛诗评[M].黄仁生,辑校.长沙:岳麓书社,1997.
- [13] 范晔,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4] 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M].胡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 [15] 胡应麟.诗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6] 许瑶.诗的情感与形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 [17] 陈伯海.意象艺术与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18] 王子尧.贵州地区夜郎民族历史文化溯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6-11.
- [19] 段宝林.民间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The Imag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Yelang in Li Bai's Poetry

HAN Daqiang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Yelang was the first state established by the ancestors of th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ern China. In ancient times, Yelang had been recorded in history as the name of a state, an ethnic group, a person, a prefecture, a county and a dam, etc. Because of the incident involving Prince Li Lin of the Tang Dynasty, Li Bai was exiled to Yelang, where he wrote more than 30 poems related to Yelang. Later, poets and scholars also wrote some works about Yelang, especially including many poems expressing sympathy for Li Bai's exile, and Yelang became a symbol of sorrow and frustration. Therefore, the Yelang image generated by Li Bai's exile and works about Yelang has become a unique image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oday, Yelang has evolved into a proper term with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becoming a symbol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ern China.

Key words: Yelang; Li Bai; poetic image; cultural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赵婧)